

古文字研究

徐中舒



H131
S 000

古文字研究

第六輯

中華書局

四川大學歷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編

古 文 字 研 究

(第 六 辑)

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胶 印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1/16 26 3/4 印张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统一书号: 3018.126 定价: 4.90元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在四川大學召開敬賦二首

千載揚雄道不孤
文光彪炳聚成都
駢闐龍水雲亭路
盡是耆英問字車
遼海珠江兩會纔
蜀山今雨八方來
古文字比羣芳
艷寰宇同春處
開

本會前年成立於長春吉林大學去年召

開於廣州中山大學今年國外學者參加者尤多焉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二日 啓功具草



目錄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紀要	一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辭（日・伊藤道治）	八
我對古文字的點滴認識（羅福頤）	九
重論『余一人』問題（胡厚宣）	一五
甲骨刻辭狩獵考（姚孝遂）	三四
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林 沅）	六七
殷曆考辨（常正光）	九三
試論卜辭中的師和旅（肖 楠）	一二三
釋戡（張政烺）	一三三
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管燮初）	一四一
甲骨文字考釋二則（胡澥成）	一五〇
甲骨金文零釋（張亞初）	一五七
學習古文字隨記二則（夏 涿）	一七一
卜辭考釋數則（邨 笛）	一八一
甲骨文『出』字試探（黃錫全）	一九五

甲骨文釋文二則（沈建華）

二〇七

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構形關係（趙誠）

二二一

甲骨文異字同形例（陳煒湛）

二二七

有關語詞「虫」的用法問題（日、伊藤道治）

二五一

論「𠄎」組卜辭的時代（裘錫圭）

二六三

武丁時另種類型卜辭分期研究（謝濟）

三三二

甲骨的鑿鑽形態與分期斷代研究（于秀卿 賈雙喜 徐自強）

三四五

甲骨文偽造問題新探（日、松丸道雄）

三八〇

周原卜辭十篇選釋及斷代（徐錫臺）

四〇一

「王曰我枚單𠄎勿卜」解（田宜超）

四二三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紀要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於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成都舉行。這是繼一九七八年長春成立大會，一九七九年廣州第二屆年會之後我國古文字學術界的又一次盛會。

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的委託，本屆年會由四川大學歷史系和漢語大字典四川編輯組主辦，由徐中舒同志任召集人。年會籌備小組由徐中舒同志任組長，許琦之、崔之富、陳賢華任副組長。在籌備過程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和四川黨政領導部門的關懷和支持，得到了全國各地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贊助和支持。北京、天津、上海、吉林、遼寧、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雲南、甘肅、廣東、內蒙、福建、浙江、四川等二十個省市的五十二個科研機構、高等學校、考古文物單位、新聞出版部門的七十四位正式代表和五十八名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還得到了海外從事中國古文字學研究的朋友們的盛情支持。日本學者伊藤道治、松丸道雄、小南一郎、江村治樹、美國學者周鴻翔、澳大利亞學者張光裕和香港學者饒宗頤、常宗豪、許禮平等不遠千里萬里，前來參加會議，並提交了學術論文，受到了代表們的熱烈歡迎。馬來西亞學者鄭良樹先生已寄來了論文，但因故未能到會。

四川黨政領導部門的負責同志杜心源、何郝炬、彭迪先、張秀熟、沈一之、丁耽林、袁明阮、四川大學代校長趙鐸、副校長許琦之等出席了九月二十二日的開幕式。

並與這次到會的全體同志合影留念。新華社和四川、成都的新聞單位，也派出記者參加會議，對會議給予了熱情的支持。

年會的領導小組，由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的到會理事組成，名單如下：（按姓氏筆劃為序）于豪亮、馬國權、李學勤、張政娘、張領、羅福頤、胡厚宣、趙誠、徐中舒、姚孝遂、高明、商承祚、曾憲通、裘錫圭。由徐中舒同志任召集人，趙誠同志任年會秘書長，年會的會務組長由趙迎生同志擔任。

這次年會認真貫徹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外的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在會上會下的討論中，廣泛交流了研究成果及研究資料，互相學習，互相提高，對促進古文字學科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年會共收到論文七十八篇，其中包括了古文字學理論、綜述、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漢、其他文字等相當廣泛的內容。有六十二位同志先後在會上宣讀或介紹了他們的論文。日本的伊藤道治教授、松丸道雄教授，也在會上宣讀了論文，在他們宣讀之後，與會的專家們紛紛提出問題，進行研討，使會場空氣十分活躍。美國周鴻翔教授介紹了他在國外研究中國古文字的情況，澳國張光裕博士談了他在海外致力於金文材料的搜集，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

會議的討論從如何科學地考釋古文字問題開始，有十四位同志，就這一問題發言，爭論比較熱烈。胡澂威同志認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建立有關古文字的理論，研究古文字發展變化的規律，他認為用同音通假的方法來訓詁文字是不妥當的。夏滌同志認為，目前很多古文字資料尚未公佈，要建立科學理論為時尚早，但現在可以總結出一些方法來。他宣讀了他在考釋古文字時使用的八種方法。裘錫圭、林沅、陳煒湛等

同志在發言中，從不同的角度指出，在古文字學多年研究中，已經總結了一些比較科學的方法，關鍵在於我們應當有堅實的基礎知識，並正確地使用這些方法。不能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考釋文字。高明同志介紹了他對古文字偏旁的分析，認為古文字偏旁有一百四十多個，不少義近形旁可以通用。常正光同志以「辰」、「祀」二字考釋為例，強調考釋古文字要密切注意古代的生活、生產實踐，同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趙誠同志強調要注意古文字發展變化的內部規律，並就形和音的二重性問題進行了闡述。姚孝遂同志則認為從甲骨文以來，漢字已有嚴格的體系，不是以形見義為主，而應以聲求義為主，考釋文字必須和語言聯繫起來。伍仕謙同志的論文強調了考釋古文字既要嚴格依據《說文解字》，又不能墨守《說文》，不能孤立地一個字一個字去探討。應該聯繫有關的字形，首先探索文字的原形及原義。擔任漢語大字典主編的徐中舒同志在會上介紹了他為《古文字字形表》所寫的序言，他說：「漢字發展有兩個階段，一是表意階段，二是形音義結合的表音階段，文字最初是群眾共同創造的，後來在巫師卜人集團中得到了發展和流傳，逐步形成了共同遵守的條例，這就是後來的『六書』」。接着他對六書提出了新的解釋。黃盛璋同志在大會發言，就古文字學的性質、對象、方法進行研究的條件，以及提高古文字學研究水平應注意的問題談了很多意見，受到了與會同志的歡迎。總的說來，這個問題的爭論，是主形、主音二者孰重的爭論，大家已經充分談出自己的見解，與會者從這些發言中，得到很大的啟發。

對甲骨文的討論，是從卜辭分期這個重要而又頗有分歧的問題開始的。裘錫圭同志在會上闡述了他對整組卜辭進行研究之後的看法，他認為整組卜辭屬早期，不是他

首先提出的。但這組卜辭確是一、二期。李學勤同志詳細介紹了提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闡明整組卜辭是一期卜辭的理由。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小屯南地甲骨組的同志們，在會上則根據發現整組卜辭的地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整組卜辭應為三、四期。徐自強同志介紹了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對館藏甲骨的鑿鑽形態的觀察、分類、排比之後，初步總結出的一些規律，為卜辭分期提供了新的資料。此外對王族、多子族、自組、午組卜辭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到會同志也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

對甲骨的辨偽問題，首先由商承祚同志提出了他多年研究中關於甲骨辨偽的意見。松九道雄先生認為在甲骨發現的早期，作偽者的水平低於研究者的鑑別能力，辨偽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後來作偽者技術水平提高了，後期問世的甲骨資料中的辨偽問題，應引起甲骨學者的進一步注意。還有龜甲獸骨質地堅硬，殷代卜人究竟如何進行契刻，周鴻翔先生介紹了他進行多年研究與實驗的情況，引起了與會者很大的興趣。胡厚宣同志介紹了他近年收集到的卜辭中有關「余一人」記載的新材料，特別向大家介紹了利用殘碎甲骨材料的一些經驗。姚孝遂同志談了他的論文《甲骨刻辭狩獵考》的要點，認為殷王的田獵決不只是單純的畋樂，而是與軍事、祭祀、生產等密切相關。又談到考釋文字時必須注意字形的細微區別，他還舉了一些實際的字例說明問題，對大家很有啟發。本屆年會收到的七十多篇論文中，有一半以上是有關甲骨文字的，這是本屆年會的特色。其主要內容涉及考釋方法、考釋某些文字、甲骨分期、甲骨辨偽、殷商曆法、田遊、祭祀等問題。一般都能有所發明，更可貴的是在考釋甲骨文字的論文中，有吉林大學、四川大學等單位的十二位青年同志，還有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的代表。

列席大會，並在會上介紹了他們的學習和研究情況，他們都得到了全體與會同志的支持和鼓勵，同志們一致感到古文字專業後繼有人，尤其幾位八十高齡的老專家更感到「吾道不孤」，十分高興。

大會討論了漢語大字典的編寫工作如何反映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問題，首先由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輯徐永年同志報告字形表編寫經過及選字原則，最後由主編徐中舒先生審定。要求與會的專家們對漢語字形表工作盡量提出改進意見，以便將來能夠順利地進行編寫工作。與會同志紛紛提出寶貴的建議，希望集思廣益，編好大字典。美國周鴻翔教授說：「臺灣曾編了一部所謂的大字典，實際上是一些不學無術的人，亂搞一通，在海外鬧成了笑話。我們希望漢語大字典的編輯們腳踏實地，不尚空談，認真編好一部很有水平的字典，能够反映國內最高水平的字典，不要辜負中外人士的希望。」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同志保證，不論需要何種資料，只要館內有的，都大力提供。

管燮初同志在會上宣讀了《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一文，饒宗頤先生也宣讀了《略論馬王堆易經寫本》，一方面對管先生的文章提了補充意見，另一方面比較了馬本易經和漢初易經的不同點，並高度評價了馬本的價值。張政娘同志也就管燮初同志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張頌同志認為青銅器那些奇異的刻辭，是周易卦文的可能性極大。他們都希望考古界同志早一點發表這些有關材料，使得學術界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劉雨同志不同意饒宗頤、管燮初兩同志關於「八卦」符號在銘文中可作為人名或族氏名的說法，並對中方鼎銘文的讀法提出自己的見解。總之，這一個問題，爭論比較熱烈，也沒有得出一定的結論，留待以後繼續研究。考古所的同志們跟着發言，說他們人力不夠，地下發現了新材料，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整理，所以不能在

很短的時間公佈。

關於銅器辨偽問題。張光裕先生就散氏盤的翻鑄、流傳，以及拓本真偽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商承祚同志談到，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曾親手拓過散氏盤。他就張光裕的報告作了詳盡的補充，並就辨別散氏盤拓本的真偽問題講了自己的經驗。

關於戰國秦漢文字的解釋，于豪亮同志就漢簡中的草書考釋問題談了自己的體會，並舉了實例，校正了前人對於漢簡文字的誤釋。馬國權同志在大會上宣讀了《古璽文字初探》的要點，他認為近年許多戰國文字，陸續問世，提供了研究六國文字的好條件，肯定可以把古銘文字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孫常敘同志、劉啟益同志、吳鎮峰、孫稚離、王少清、曾憲通、李仲操、郝本性、楊五銘等同志均在大會發言，說明自己論文的重點，對西周金文、戰國文字的考釋及新出土的戰國銅器年代等問題，談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與會代表們極大的注意。在閉幕式會上，代表們自由發言，很多代表在會上表示，這次年會無論就代表的數量和代表的廣泛性，還是就提交年會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來看，都明顯地超過了前兩屆年會，大家對古文字研究隊伍的擴大，十分高興，對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前景充滿了信心。

不少代表在會上發出呼籲，希望考古界和出版界的同志們能盡力讓新的古文字材料和研究的成果早日與大家見面，給古文字的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的條件，反映最新的成果。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在年會期間召開了會議，回顧和總結了一年來的工作，並向年會作了簡要的彙報，理事會決定第四屆年會明年在山西太原舉行，委託山西文

物局籌備第四屆年會，由張頴同志為召集人。理事會號召古文字工作同志們，刻苦學習，努力鑽研，加強聯繫，互相協作，特別要注意新出土材料的研究工作，爭取以比今年優異的成績，參加明年山西的第四屆年會。

起草人：伍仕謙

林 沅

陳煒湛

經一九八〇年九月廿六日夜理事會通過，最後由徐中舒、張政烺、李學勤、胡厚宣、趙誠五位理事最後審改定稿。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第三屆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辭

(日) 伊藤道治

首先，讓我代表來參加大會的四位日本同仁，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的召開表示祝賀，同時也衷心感謝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使我們能够參加這次盛會。

在我們開始研究古文字的時候，是通過徐中舒先生、商承祚先生等老專家的著作打下研究基礎的。從目前積極活躍、成為中堅的各位先生的著述中，我們也學習到了不少新問題。因此，能够來成都參加會議，同各位老師、各位同道一起進行學術討論，我們的心情是喜悅的。我想，當初唐代來貴國的留學生們，也許和我們有同樣的感受吧！

來參加會議的還有美國、澳大利亞和香港等地的先生們，這表明了研究工作的國際交流正日趨興盛。祝中國古文字研究日益發展。謹此致意，並表示感謝！

我對古文字的點滴認識

羅福頤

我國研究古文字開始於宋代，因祖國歷史悠久，記載傳說遠古文字有古文，有籀文，由秦李斯改古文為秦篆，由秦篆而小篆，而隸書，由隸書而楷書、草書，直至今日通行之文字，其中間變化因革向無科學之記錄，各家傳說人自不同，據古文字學者稱，昔日記載某人作籀文、某人作大篆之說，似未必然，可能祖國書體之變遷，皆出於自然之蛻化，不過今日尚無科學之佐證。於此知，今日我輩對古文字了解之不足，今後若不重視古文字研究，則祖國歷史認識，將難以發展。過去商周歷史之肯定，皆由於前人研究古文字之收獲，却今日我輩，不能以前人之成果而自滿，如商前之夏代史，以至唐虞之遠古史，將來地下有可能發見資料，則我國歷史當可推進。回憶清末河南安陽之出甲骨，當時，無人預知是區々者能落實三千年前殷商古史，乃以前人之努力，得獲巨大之成就。可見，古文字研究前途發展是遠大的。

有人問，過去商周史之落實，史學專家固所熟悉，而一般初學，未必盡人皆知，可否略述過程，用示來者，案，祖國遠古歷史，傳說是始於黃帝，近世學者雖承認唐虞之世，但總以古史渺茫類於神話，入之正史，以為不合理。因此認為，祖國歷史開幕時期，當從殷代開始，考殷商立國，距今約在三十七百多年前（公元前一千七百多年前），近世學者所以敢肯定始於商代者，實據清末，河南省安陽出土殷商卜骨，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研究之結果，由卜骨上刻有殷代帝王祭他祖先王亥、王恒等記事，與漢代司馬遷著《史記》中之《殷本紀》及其它古史有可印證，以此落實，是為殷商歷

史科學資料，並知《殷本紀》記載亦有所本，繼之國外史學專家，亦莫不首肯，於是，祖國殷商古史乃得落實。

次之兩周史，周代歷史記載原多於商，加以自宋代起，研究古彝器文字者，從出土地和文字上，考訂是為商周遺物，經過清代學者繼續發展，加之孟鼎、克鼎、毛公鼎諸重器之發見，研究者公認彝器銘文中記事，有些可與《詩經》《書經》以致《史記·周本紀》所述史事符合，於是，周代史乃獲得科學資料，並知《史記·周本紀》中述周代世次和其歷史，多半可信，於是證實，周文、武、成、康前後史迹是無可非議的。

由於殷周二代地下史料之出土，經過前人考證，於是，中國遠古史乃信而有徵，此自是近百年來研究古文字學者之豐功偉績，若不然，我們今天談到商周史，還要依仗過去模糊之記載，豈不為識者所竊笑。

今日，我們能因前人之功，確定了三千七百多年前的古史，是今天我們值得自豪的事，前人努力有這樣的收穫，更堅定我輩對將來之信心，希望祖國古史更能進一步提高，絕非全屬想像之事。

因此，進一步認識到，地下史料是寶貴的，而我國古史之記載，能作地下史料之佐證，可見古史書與地下史料，是有辯證的聯系，試思若《史記》無《殷本紀》，今人雖得到殷商甲骨文，也無從判斷其時代，後人若只見到周代銅器銘文，若無《周本紀》之記事，單憑吉金銘文，是無徵不信，所以說，地下文物與古書記載，是相應為用，相得益彰。要知，地下史料只是片面之實物，證以史書記載，方若合符節，只信地下史料，不與史書參證，與死守古記載，棄地下史料於不顧，偏左偏右是同一弊

病。

商周地下史料，都是商周人的記述，它自是用二三千年前文字、語法來書寫的。當時習俗、語言，自不同於今日，加以古代文字在書體上，有合文及用假借字之習慣，古音、古訓，又多與今不同，以此要通讀古代語言、文字，必須熟習古代制度情況，更研究者又要熟習參證古書，來解釋古文字，問到有否前人運用考釋方法之前例，今可舉吳大澂著《文字說》作為典型，茲轉錄後：

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詩江漢告於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壽卿編修介祺所藏分中鐘云，其用追孝於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於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於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敢不於前寧人攸受休畢，曰天亦惟休於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案，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蓋因古文、文字有從心者，或作，或作，或又作，壁中古文大誥篇，其「文」字必與「寧」字相似，漢儒遂誤釋為寧。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寧王即文王，寧考即文考，民獻有十夫，即武王之亂臣十人也，寧王遺我大寶龜，鄭注，受命曰寧王，此鄭氏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也，既以寧考為武王，遂以大誥為成王之誥，不見古器，不識真古文，安知寧字為文之誤哉。

上吳氏文章可謂簡明扼要，他據彝器文中之「文」字，悟出傳世《書經·大誥篇》中之「前寧人」一語，實為「前文人」之誤。他進一步認識到，漢人鄭注強解「寧王」為受命稱之誤。從一個古「文」字，而觸類旁通，於此可見學者研究古文字之重要，豈虛語哉。